

# 風土、知識與族群韌性： 檳城浮羅山背榴槤小農種植的民族誌研究

簡美玲\*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兼客家文化學院院長

潘怡潔

馬來西亞檳州研究院歷史與區域研究組分析員

本文透過以客家人為主的榴槤園主／種植者的深度訪談敘事，關注馬來西亞檳城浮羅山背的小型榴槤園業，以此所開展兩層問題意識。其一，探索檳城浮羅山背及周圍區域盛行的小型榴槤園，其特殊性與發展路徑，如何體現在地域環境特性、種植者的族群文化、家庭背景、資源差異，以及對於榴槤園差異的想像及行動。而這背後又浮現何種客家及其周邊族群的在地特性與韌性？其二，以檳城浮羅為田野，關注浮羅山背的氣候、風土，及採用的慣行農法、種植的品種等，如何形塑種植者與榴槤之間的關係。在這過程中，榴槤園如何成為一個具體的微宇宙——在有限的土地邊界裡，蘊含了各式各樣，有形與無形的人與非人的多物種互動關係，以及知識體系。透過受訪者的生命史敘事、勞動與知識，型塑、思索族群韌性與小農榴槤園子的傳承、知識技術與生態環境的永續價值。

關鍵字：榴槤、客家族群、在地知識與傳承、族群韌性、馬來西亞檳城

---

\* E-mail: mlchien@nycu.edu.tw

投稿日期：2024 年 3 月 5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5 年 5 月 22 日

## 一、前言

### (一) 當代馬來西亞榴槿產業概況

榴槿，已是馬來西亞當今最佔地最廣的農業種植作物。根據 2022 年馬來西亞農業部統計數據，榴槿躍居馬來西亞十種主要農作物的第一名。榴槿的總種植面積，高達 8 萬 7 千 277 公頃，佔全馬總農業土地的 48.5% (Jabatan Pertanian Malaysia 2023: 6)。<sup>1</sup> 這與近 15 年來，榴槿成為熱門且具龐大商機之外銷作物，緊密關聯。<sup>2</sup> 發跡於馬來西亞吉蘭丹州的著名品種貓山王 (Musang King)，尤其受到區域市場的歡迎與喜愛，包括市場規模最大的中國。在 2017 年，貓山王的價格已穩定邁向 1 公斤馬幣 100 元的價格，奠定了貓山王出口的地位 (Abdul Aziz Zakaria 2020)。而大量的外銷商機，也使得馬來西亞各地的榴槿園，近十餘年來紛紛興起了種植貓山王與黑刺等，具有外銷價值的榴槿名種熱潮 (圖 1)。

若將焦點置於馬來西亞各州，位於馬來半島南端的柔佛州，擁有最多的榴槿種植面積，近 2 萬公頃；而位於中馬的彭亨州，以接近 1 萬 6 千公頃的榴槿種植地，位居第二。位於東馬的砂勞越，榴槿種植面積則接近 1 萬 3 千公頃，位居第三。檳城則因其整體土地規模較小，可耕地也較少，榴槿種植面積僅接近 2 千公頃，屬於較小規模的榴槿產區 (Jabatan Pertanian Malaysia 2023: 6)。

1 根據馬來西亞農業部 2022 年的統計數據，若以水果種植面積而言，榴槿種植面積為所有水果之最，相對於排名第二名的香蕉種植 (佔地約 2 萬 7,576 公頃)，超過二倍以上。

2 根據統計，在 2022 年馬來西亞整體榴槿的出口，高達馬幣 11 億 4,000 萬元，折合臺幣約 78 億 6,600 萬元。



圖 1 榴槤名種的販售

說明：榴槤名種的販售，已發展出相當精緻的品牌作為行銷策略。  
資料來源：怪獸水果宅急便（2020）。

在此，我們稍微轉入馬來西亞其他州屬之榴槤產區的樣貌。位居中南馬的柔佛州與彭亨州<sup>3</sup>，是馬來西亞土地較大的州屬。在這些州內，常見動輒數百公畝以上的榴槤園。園主為此投入頗具規模的資本，以及運用商業經營策略。例如，專種名種榴槤，投資相關設備，將大量心力投注於榴槤的外銷出口。相對於此，檳島上的榴槤園，大多屬於 20 公畝以下的小型榴槤園。由於土地規模較小，整體產量不若大型園子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這些小園子裡，除了種植當今盛行的名種榴槤外，也保留著其他在市場上非屬於高價的榴槤品種。這些品種雖未成為流行名種，但仍獨具風味與各有其支持者。這些老樹品種，可能是數十年前種植，過往曾在島上流行過，或者許多也是馬來西亞當地俗稱的

3 以地理位置區分，指馬來西亞半島中部與南部州屬，包括彭亨州、柔佛州等重要的榴槤種植區。

鄉村老樹榴槿，意指那些一代代自然地生長於園子間的老榴槿樹種<sup>4</sup>。

而榴槿作為馬來西亞當今產值最高的農業出口作物，為國家經濟帶來可觀的收益，也促使政府積極地與其他外銷國建立更緊密的合作。如馬來西亞與中國，近 10 多年來逐步開展更多樣化的榴槿出口形式，嘉惠了馬來西亞在地的榴槿種植業者。榴槿外銷至中國，從 2011 年時僅能以榴槿果肉與榴槿膏的方式出口，至 2018 年，開始可出口冷凍帶籽果肉，與之後的冷凍帶殼榴槿，直到 2024 年 6 月，則更進一步開放新鮮榴槿出口（Bernama 2024）。榴槿出口政策的持續演進，對馬來西亞榴槿相關產業的業者而言，都是相當重大的突破與助益；馬來西亞農業部相信此政策會造福本地超過 6 萬 3 千名的榴槿種植業者（Bernama 2024）。

## （二）品種的追求

榴槿的種植與發展歷程，在一定程度上，可說圍繞著對於品種的追求而生。在馬來西亞，榴槿本身富含社會文化意涵。榴槿季節是朋友們相聚品嚐榴槿的重要時節（圖 2）。時至榴槿季，約是五月至八月，品嚐榴槿的形式相當多元。在檳城，有些家人或朋友會相約至山上的榴槿園裡品嚐，或者，簡單一點，路邊、菜市場皆有小攤販兜售一盒盒的榴槿，獨享也佳（圖 3）。在馬來西亞，從過去至今，榴槿的品種超過 100 種，係經由不斷培育而成；有些榴槿品種是跨越州屬的流行，有些則是較盛行於某些州。但也有些品種，則在時代的進展下，逐漸

---

4 鄉村榴槿（Durian Kampung），是泛指那些榴槿的老樹品種，因相對於其他插枝而成的樹種，老樹品種的形狀或者果實的味覺，通常未標準化，而具多樣性。

消退。<sup>5</sup> 今日較為常見與盛行的品種，包括源自或盛行於中南馬的貓山王（D197）、XO、D24、金鳳（D198）、D13、D1、紅肉（D101）、竹腳（D160），以及檳城著名的葫蘆（D163）、紅蝦（D175）、黑刺（D200）、青皮、白肉、梅花、「林鳳嬌」等（MyTravel 2024）。不同榴槿品種，從外觀到果肉的質地、色澤與氣味，都有其差異。對種植者與榴槿老饕而言，這些差異正是樂趣與品嘗的重點所在。



圖 2 榴槿季時的餐桌

說明：a. 榴槿季也通常是親朋好友一起同樂的時節，餐桌上往往充滿各種不同品種的榴槿，供大家品嘗。

b. 作者於 2020 年 7 月 7 日檳城浮羅山背拍攝。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5 馬來西亞榴槿品種的正式稱呼，以其在馬來西亞農業部的註冊順序為編號，皆以英文字母 D 開頭，如著名的貓山王為 D197。



圖 3 榴槤攤販

說明：a. 榴槤季節時，在街邊、市場時常可見榴槤攤販。攤主拿著幾粒榴槤，簡單的設置，即可開始販售。

b. 作者於 2024 年 7 月 1 日檳城丹絨武雅的早市拍攝。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 （三）榴槤園的耕植技藝

一個榴槤園的樣貌，展現園主與種植工人對於園子的想望。具體的包括選擇種植的品種，可能完全以榴槤為主，或加上一些常見的果樹，如紅毛丹、榴槤蜜與波羅蜜等；或有些是採行有機的種植，因而園子裡充滿了較多的野花與野草。而園子的經營，也關乎園主擁有的勞力資源。由於打理榴槤園牽涉許多勞力工作，園主多半會雇用幾位外籍移工（尤其因印尼與馬來語相通，印尼籍勞工為眾。此外也有來自緬甸、孟加拉的勞工），幫忙摘榴槤果，處理野草等。再者，園主或者栽種者，也需要細心地觀察榴槤樹的變化，甚至是不同物種之間的關係。如榴槤樹葉的變化，可能表示有病蟲害孳生，便需要灑藥驅蟲，救治生病的樹。又因榴槤種植仰賴持續投入的勞力與心力，在收成時，更需細心處理，熟成、掉落的珍貴果實。有些園主會以勾果的方式，採摘果實。榴槤果實最佳賞味期，在榴槤落下後的兩到三天。若時間拖得太長，榴槤肉的

品質與口感都會受到影響。這也深刻影響榴槿果實的運輸與販售。種植者將果實交由中盤商，或者現今所流行的一在榴槿季節，吸引消費者到榴槿園裡，享用當季果實。

#### (四) 問題意識

承上述，本文將以馬來西亞檳城的小型榴槿園種植業作為關注焦點，開展兩層問題意識。其一 探討檳城所盛行的小型榴槿園，與其他州屬之大型榴槿產區的差異。即檳城浮羅山背及周圍區域幾個小型榴槿園的特殊性與發展路徑，如何體現在地域環境特性、種植者的族群文化、家庭背景、資源差異，以及對於榴槿園的想像及行動。而這背後又呈現出何種榴槿種植與環境之交互，所浮現之客家及其周邊族群的在地特性與韌性？其二，以檳城浮羅為田野，探討一年一至兩季的榴槿生產，根據種植地的氣候、風土，及採用的慣行農法、種植的品種等，如何形塑種植者與榴槿之間的關係。榴槿園如何成為一個具體的微宇宙－在有限的土地邊界裡，蘊含了各式各樣，有形與無形的人與非人的關係，以及知識體系。一個榴槿園的樣貌，展現出園主與種植工人對於園子的期望。本文將探討與闡述在檳城的浮羅山背，一個榴槿園，如何即是人與榴槿樹、其他物種，透過技術、知識與盼望，在日常生活投注勞動心力的小世界，彼此緊密纏繞著。而探索園子裡地景的變化，如不同世代的園主或耕植者，對於榴槿樹種的選擇，及其變遷，若將之置於較長時段的脈絡於以觀之，也是關照整體山林變化。尤其是本文所關注的檳城浮羅山背，許多山林都經歷過從種植香料，轉變成榴槿芭（山）的歷史過程（圖4）。



圖 4 榴槤樹

說明：a. 在進入浮羅山背的山路中，時常可見沿路高聳的榴槤樹。

b. 作者拍攝於 2023 年 4 月 9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 二、研究地點與研究方法

檳城（Penang）是馬來西亞北部的一個州屬，包括檳島，及位於馬來半島上的威省。在馬來西亞十三個州屬中，檳城擁有較高的華人比例，在 2020 年的全國人口統計中，檳城的華人與包含馬來社群的土著族群分類，呈現相近的人口比例。<sup>6</sup> 若進入檳島，依地理位置分為兩區，分別為以喬治市（George Town）為中心的東北區，人口較為稠密；與另一側西南區，即包括此文所關注的浮羅山背等地（圖 5）。喬治市，自檳城於 18 世紀末逐漸納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體系以來，逐漸發展成為蓬勃的自由港，運轉著來自周圍區域，貨物的港口。喬治市的轉運港口特質，吸引著歐亞區域的商賈、勞動階層與移民，帶著各自的文

6 根據馬來西亞經濟部統計局資料，2024 檳城人口預估統計數據的比例，土著人口（馬來人加其他分類）約占 45.9%，華人人口約占 43.9%（Current Population Estimates by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2025）。

化與宗教信仰，移動與定居，逐漸揉雜而成今日喬治市與島上的跨文化建築風格與文化樣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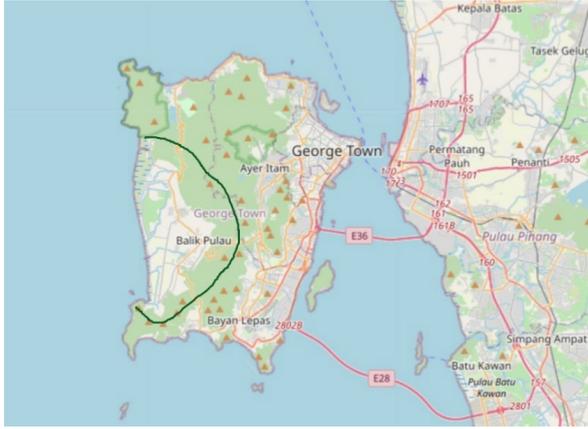


圖 5 檳島與浮羅山背地圖

說明：檳島與浮羅山背，綠色部分為浮羅山背區域（作者所加）。  
資料來源：OpenStreetMap (2024a)<sup>7</sup>。

在 19 世紀，一些早期移居至檳城的華人，許多是較早期已移居至其他州屬，之後隨著喬治市興盛的港口發展，逐漸遷居至檳城。19 世紀末期至 20 世紀初則有許多從華南閩粵等地來的移民。這些華人移民，各自帶著家鄉的語言、文化風俗，形成以血緣、地緣與業緣關係所建立的會館，支撐著當時檳城華人移民的社會關係。以喬治市而言，其中較引人注目的是在 19 世紀檳城經濟扮演關鍵角色的福建商人，他們透過跨族群的通婚聯姻、商業的往來，共同擴展了檳城在周圍區域之間的影響力 (Wong 2015)。2008 年，喬治市與馬六甲共同列名為世界文化遺產，表揚兩個位於馬六甲海峽的城市，在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層面，見證

7 此資料來源至 OpenStreetMap 的公開資料授權，特此感謝。

幾個世紀以來多元文化的影響。

### （一）研究地點

相對於在當代仍具有政治文化影響力的喬治市，位於島嶼西南部的浮羅山背（Balik Pulau），歷史上則以長期的種植發展為其傳統。浮羅山背所在檳島西南部，共 173 平方公里，相對於東北部的 119 平方公里，較為寬廣（BPEN 2019: 11）。因而，不同於東北部人口密度高，浮羅山背的山林覆蓋，則使得人群與地理環境的關係，顯得較為舒緩。根據 Christopher Airriess（2020）的研究，2017 年，浮羅山背所在的檳島西南區約有 632 個榴槤園，大部分以 6 至 8 公畝的小園子為主，僅有小部分的園子超過 20 公畝。

浮羅山背位於檳島中央山系（升旗山）另一側的環山處，也因其相對於檳島的東北部，位於背山之處而得名。浮羅山背的地勢與自然環境相當多元，從市鎮中心所在的平地，橫闊到海拔數百公尺的山林。浮羅擁有悠久的種植傳統。在殖民時期，浮羅山背就是重要的種植區。早期種植甘蜜、荳蔻與丁香等熱帶香料。近數十年，許多的種植園轉為種植榴槤。因而，今日的檳城人常會稱呼這些種滿榴槤的山林為榴槤芭（山）。浮羅作為檳島知名的榴槤產區，每逢 5 至 8 月的榴槤季，總是吸引許多本地與外國遊客，上山品嚐美味的榴槤。大大小小的榴槤園子，各有其主打的項目（圖 6、圖 7）。浮羅山背之外，在檳島東北部的市區與路邊，榴槤季節時，也可見標榜著販售浮羅山背（名種）的榴槤小攤。顯見浮羅山背榴槤在檳城的高人氣指數（圖 8、圖 9、圖 10）。



圖 6 馬來人社群的榴槤攤

說明：a. 馬來人社群的攤口，在榴槤季時也十分普遍。從簡單的路邊小攤販，到精緻的品牌經營皆有。

b. 作者拍攝於 2023 年 6 月 23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7 榴槤小攤

說明：a. 榴槤季時，浮羅山背的路邊與空地，時常可見馬來人與華人販售本地榴槤的小攤。

b. 作者拍攝於 2022 年 7 月 9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8 浮羅山背名種榴槤

說明：a. 在檳島市區，時常可見標榜著「浮羅山背名種榴槤」的廣告布條作為宣傳。此為位於丹絨武雅 (Tanjung Bungah) 的一處早市，布條上所列的榴槤名種，包括黑刺、貓山王、白玉珍珠、紅蝦與胡蘆。

b. 作者拍攝於 2024 年 6 月 25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9 榴槤小貨車

說明：a. 榴槤季時，檳城路邊可見販賣榴槤的小貨車，浮羅山背的榴槤，深獲大眾喜愛（海報左上角有 Balik Pulau 字樣）。

b. 作者拍攝於 2024 年 7 月 6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10 榴槤看板

說明：a. 在路邊的小攤，豎立著簡單的浮羅山背榴槤作為宣傳。

b. 作者拍攝於 2024 年 7 月 6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透過歷史檔案，Mohd. Nasser Bin Malim（2016）爬梳浮羅山背從 1888 年至 1956 年獨立前的族群地理、經濟型態與土地利用的轉變，提供一個跨時性的歷史觀點。研究指出，自 1888 年之後，在浮羅，人數較多的馬來人逐漸建立起傳統家屋與聚落，而華人則多集中在設有殖民政府行政中心的市鎮區域開發，此處也為商業活動聚集之處（2016：34）。至 20 世紀初期，隨著檳城整體人口不斷成長，從當時所實行的人口普查中，可看出浮羅山背城鎮於整體檳城的人口占比，約在 10 至 11% 左右（2016：35）。根據 2020 的人口普查數據，浮羅的總人口數約為 13 萬 2344 人，以馬來族群最多，大約超過 65%，華人約占 29%，印度社群數量較少，約占 5%，另外也包括少量的非本國人。<sup>8</sup>

以華人族群分布的角度，相對於喬治市以福建、廣東與海南等為主要的方言群，**浮羅山背則是檳島主要的客家人聚集區域**，這與客家人傳統居於山林之間，有著密切關係。溫梓川（1979：719）先生於 1979 年書寫的文章指出，根據口述歷史資料，19 世紀末期已有一些原居於北部州屬，如吉打（Kedah）等地的客家人，因避亂而移居至浮羅山背的山區定居。他們以農耕種植維生，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而浮羅山背的鄰近市鎮，如亞依淡（Air Itam），也是這些早期客家移居者移動、日常通行的區域。即使較為片段，這些口述歷史提供了早期客家移民遷移到浮羅山背的背景、從事的經濟活動與移動路徑等珍貴的紀錄。另外，在 1856 年，浮羅山背已有華人公塚的設立。從墓碑可見多為惠州人，足見早期客家人在浮羅的蹤跡；而於 1854 年建於浮羅市街的耶穌聖名堂，也與當地客家人多數歸屬於天主教，有著密切關連（ibid）。耶穌

8 此處資料引用至維基百科內所登錄的 2022 年浮羅山背選區的選民結構分析，其真實比例與實際上的族群比例，會有些許的差異，然仍具有參考的價值。

聖名堂是浮羅山背第一間天主堂，也是馬來西亞第一間以客家話作彌沙傳教的天主堂。早期的客家族群，除了居住於市街外，也有許多家戶居於山林，從事墾殖工作。換言之在浮羅山背的客家人，多數具有種植的傳統。

湯九懿（2011）的研究，尤以荳蔻為關注焦點，闡述當代浮羅山背客家人與種植園傳統的重要關聯。她梳理了英殖民時期以來，浮羅山背荳蔻業發展的過程。約在 1796 年至 1802 年間，英國人引進荳蔻樹至檳城，進行大規模種植；而 1841 年後，英國東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00-1707;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1707-1874），為了解決當時浮羅山背的種植園，多由歐洲大規模資本所控制，然而卻對香料的發展未積極投入。因而鼓勵這些由歐洲資本所開墾的種植園土地，轉賣或租賃給華人。由此開啟了新的一頁，浮羅華人開始擁有香料園，與經營香料產業。逐漸的，檳城的荳蔻收購、工廠，經營者都是以客家人為主（湯九懿 2011：1）。惟，檳城的荳蔻業發展，主要在 1860 年代達到鼎盛，之後因病蟲害，使得荳蔻的產量逐漸削減；而當代的種植，則是往後政府欲振興荳蔻產業所進行的推廣努力（湯九懿 2011：3）。

根據湯九懿的研究，浮羅山背是一個以客家人為多數的地區，尤其一半為惠州裔，其次是海陸豐，再來是河婆、大埔的客家人。根據田野中的觀察，湯九懿指出客語普遍作為浮羅山背裡，華人間重要的溝通語言。客語不僅存在於客家人間，也普遍作為非客家人間的溝通語言（湯九懿 2011：36）。但，值得注意的是，浮羅豐富的地理環境狀態，除了在山林間以客家方言群為主，其他的地理環境，也不乏其他華人方言群的聚居。在接近河口的部分，如雙溪檳榔河口（Kuala Sungai

Pinang)，以潮州人為主要社群。

綜合上述，浮羅山背華人以客家方言群為主，兼具其他方言群的特色，及傳統上基於地理條件累積而成的種植傳統，是本文關注當代浮羅榴槿種植文化的重要基礎。同時，本文前幾段所提及，檳城與中南馬大型榴槿種植區之間存在的規模與地理條件差異，也形塑著當代檳城榴槿園的獨特性。例如，在浮羅一些規模較小的榴槿園，因產量的限制，無法走大量銷售的路線，轉為認真地經營小園的氛圍，拉近與顧客的關係，讓遊客來到園子食用新鮮的榴槿。除了榴槿園的種植，也有一些園主採取複合式的經營，結合民宿，讓遊客能夠體驗榴槿園的生活。他們更重視浮羅山背的在地風土，與其他規模可觀的大型榴槿園，注重高產量的外銷出口路線，是有所差異。

因此，檳島的榴槿小園主或者種植者，如何細緻地透過敘事呈現檳城的風土環境、栽種的技藝，或者自家園子所生產之榴槿的獨特性，與其他地方園子的差異等，便成為研究方法上觀察與理解重點。再者我們也留意人的部分——他們如何從敘事中，談論個人、家族與榴槿業的關係，以及檳城的榴槿業發展。

## （二）研究方法

以此，本文聚焦於檳城浮羅山背與周圍地區，以客家人為主的榴槿園主與種植者<sup>9</sup>。探討他們在園子裡長期與榴槿樹為伍，他們與其中的知識及種植技藝間，構築的緊密關連。浮羅山背作為檳島最主要客家人聚居之處，許多園主擁有客家背景。我們的研究材料，來自 2021 年至

9 在本文所探訪的受訪者，包括浮羅山背的榴槿小園主或者替園主處理日常生活種植工作的員工者，同樣對園子與種植知識相當熟稔。

2023 年的田野調查。在這個田野過程中，我們結合走訪及參與觀察浮羅山背與周圍地區幾處不同的榴槤園，以及對近十位榴槤園主／種植者，與熟悉浮羅榴槤業的檳城人，進行深度訪談。透過這個過程，我們對浮羅榴槤業的當代樣貌，有些認識。奠基於前述理解，本文以三位榴槤園主／種植者的深度訪談敘事，作為主要的民族誌素材。其中兩位是客家人，一位是福州人（但祖父在購置土地時，基於當時與許多浮羅客家人的日常交往與訊息交換，決定買下土地，往後成為榴槤園）。

另外，本文的主要敘事者，還有一位來自檳城，但曾長年駐點於浮羅的客家籍記者。他對浮羅山背自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期的榴槤產業發展，既有來自個人人際連結的觀察，也有敏銳宏觀的批判角度。圍繞著當年幾個重要的榴槤比賽起始，生動地描述行動者間的串連、競逐，甚至一些插曲。他的敘事提供一種獨特觀點，回應檳城在面對馬來西亞眾多州屬大型榴槤產區的競爭下，作為微型產區的獨特性；以及行動者間的互動與張力，如何共同構成浮羅榴槤產業發展的樣貌。

透過前述四位受訪者的深度訪談，及實地前往幾個園子踏查榴槤園，我們試圖探索這些多數具有客家背景的種植者，其家族的遷移敘事，及開展出的榴槤種植與技術為何？本文所呈現的三位榴槤園主／種植者，其中一位客家園主，成長於天主教家庭。承襲著浮羅早期客家人信仰天主教的文化，而其園子位於較高的山頭，也呈現浮羅山區榴槤種植的某類樣貌。另一位浮羅的榴槤園主／種植者，雖然家庭為福州裔背景，但他的公公<sup>10</sup>之所以進入榴槤業，來自當年與許多客家榴槤園主前輩的互動，遂逐漸踏入此產業。這個例子也刻畫出，浮羅早期以客家方

10 臺灣稱呼為「阿公」或者「爺爺」（漢人親屬稱謂裡的 FF [Father's Father]）。

言群為主的氛圍中，跨方言群之間的交流與情誼，並構成榴槤園種植網絡中，人情的一部份。並且，他的榴槤園也是檳城少見的有機榴槤種植。再者，本文也涵蓋一位居住在檳城美湖地區（Gertak Sanggul）的客家榴槤種植者。在早期較廣義的浮羅山背地區，也包含美湖。然此地區的榴槤種植業，相對於浮羅山背，較少為人關注。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透過浮羅山背的友人介紹他的親戚，因而認識了這位榴槤種植者。由此也拓展了我們對於浮羅山背與其周圍區域榴槤種植者之在地知識的瞭解。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族群分布上，以馬來人口為眾的浮羅山背，也有許多榴槤小園子的經營者是馬來族群所經營（參圖 6、圖 7）。本文將通過受訪者的敘事，呈顯在華人觀點下，華人與馬來社群種植與經營榴槤園的特性與差異。這部分的描述，將為浮羅榴槤園種植園文化，帶出一種跨越族群的視野。然而，我們也需指出，目前本研究訪談的對象，尚未直接觸及浮羅山背的馬來人榴槤種植社群。因此受訪者敘事中的族群觀點，需放置在浮羅山背華人種植者，根據其世代居住於浮羅山背的背景、生活經驗等加總，而形成的族群比較觀點。這是無全然代表馬來人種植者的主體敘事及情況。惟，跨族群敘事，不僅出現在本文所描述與探討的敘事，也時常浮現於田野中，華人園主有關種植園的聊天及話題。亦即，華人與馬來人園主的榴槤種植文化間，展現一定程度的差異風格。

### 三、文獻回顧

Arjun Appadurai 強調在全球化的龐大力量下，地方文化通過一次又

一次的實踐過程，還是蘊含著極自主的力量——這或許可為人類社群所有區域的形成，下一個清楚的註腳：「地方性（locality）是社會生活的一部份，是在特定的鄰近區域（neighbourhood），所形成的一套價值觀。它不是憑空來自某些社會的那一套與經驗無關的準則。相反的，地方主體在特定鄰近區域的實踐行動，往往才是地方性生生不息的場域」（Appadurai 1996：198）。而有如 E. R. Leach（1954）以「搖擺理論」（oscillation）說明緬甸高地與低地社會相互影響，O. W. Wolters（1982）用南中國海的開放性與無限可能性，來喻含東南亞區域的創造力，我們或許也可以由此來想像與理解，位於馬來亞半島北部檳城浮羅山背（Balik Pulau）作為一個區域，如何與環境的變動，國家的治理，人群的移動，以及鄰近族群間的互動，構成一種共生的關係與力量，並擁有其獨特與無限的可能性。

延續前述的學術傳統，本文著重在地景與環境人類學、多物種與人群共生關係等多重面向為理論主軸，來進行浮羅山背的客家及其周邊族群所形成之地方社會的研究。同時本文的初衷，也來自於對客家與族群研究的反思。我們認為對於族群、社會文化的研究，不應僅侷限於以人為主體的視野，或本質論、文化論，做為探問客家與族群關係的切入點。以多物種的人類學研究為例，重點就在於瞭解與探索其他物種與人及環境的互動，及其對於形塑個人、族群與地方社會的影響力。

浮羅山背位於馬來亞半島檳城地區，此地為人所知是檳島客家人最密集分布的聚落，及其來自以山林為主的特色。如此的方言群特色，其族群經濟與文化的豐富性引起不少關注。而連帶著，在 2000 年代初期，眾多研究資源的進入，一些在地華人客家行動者也將族群文化視為可行

的旅遊資源。使得大約在 2010 年代中期之前，浮羅山背以客家文化為主要的觀光資源形塑，包括客家村的概念，連帶地促成一些以客家文化為主打的客家餐館興起，如著名的客家山寨。但是若就地理資源而言，浮羅山背豐富的地理景觀，在不同的地理區域也因其特色、歷史傳統構成了相異的方言群傳統，如雙溪檳榔河口是以潮州人為主，並且姓林為大宗的小漁村，地方信仰以媽祖為主。

本文的民族誌基礎，係通過馬來亞半島北部的檳城浮羅山背山區與河川流域、河港聚落與生態環境的田野研究，進行觀察、參與觀察、訪談。同時也研究英殖民時期的檔案與地方文獻、熱帶農業學者、生態與環境科學家的研究報告、期刊論文，與影像紀錄的蒐集，以及生命史訪談敘事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分析，由此探討榴槿在檳城浮羅山背，對於當地人群的生計、生活，與在地性的影響。多物種的共生，與客家及周邊族群之地方創生，地景文化間，可能有複雜的關聯，亟待進一步的探索。本文由此微觀的多維度地景、環境與多物種人類學研究與書寫，作為側寫、闡釋馬來半島北部客家與其周邊族群之互動、溝通與流動經驗的文化理解。再者榴槿以獨特方式形塑出亞洲南方的區域性，也將可說明一種超越在地性的族群研究，進入比較研究的視域。

### （一）環境人類學的探索路徑：環境不是靜態背景

環境人類學的理論思維，是引領筆者前往馬來亞半島北部的浮羅山背，進行族群研究的關鍵之一。當前地球面臨環境與氣候劇烈變遷，環境與氣候，都是近年來不同領域學者關注的議題（如 Ingold 2000；Greenough and Tsing 2003；Latour 2017）。環境或自然，早就出現在

人類學家所書寫的民族誌裡（如 Malinowski 1922）。然而不同於早期 Franz Boas 或 Alfred Kroeber 將自然視為文化的相對觀念，環境人類學在自然與文化共構的關係基礎上，肯認了自然的能動性。2011 年出版的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Today* 一書，Shoreman-Ouimet and Kopnina 在導言指出，環境人類學的理論關懷，在於文化與生態的互動，同時關注特定人群作為行動者，如何有意或無意地塑造、詮釋其所處的環境，而環境又如何形塑文化的觀點，影響人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生活，彼此相互形構。回顧過往研究，此書陳述，人類學者從感知、知識分類、語言、價值觀等不同角度切入，探討環境與文化的關聯，描述、比較不同社群或族群面對環境所建立的文化模式，抑或藉此協商族群邊界（Shoreman-Ouimet and Kopnina 2011）。此書也闡述自 1950 年以來，環境人類學理論轉變的兩個特點：其一，將研究對象置於更廣泛的政治生態系統中，重新思考與劃定研究範圍與社群界線；其次，納入歷時性（diachronique）的分析視角，關注生態不平衡（disequilibrium）的問題（轉引自 Dove and Carpenter 2008）。以及，許多地方文化或早期的習俗長久以來其實都存在著與當地環境永續共存的生態觀念。亦即，「環保」、「永續」對於許多地方文化而言，並不是一個全新、外來的概念（Shoreman-Ouimet and Kopnina 2011）。

## （二）多物種人類學：放下以人為中心，與異質 / 異種共生共生的研究思維

以多物種的人類學研究為例，重點就在於瞭解與探索其他物種與人及環境的互動，及其對於形塑個人、族群與地方社會的影響力。知名的美國人類學者 Anna Tsing（2015），研究北美、東亞、東南亞等跨洲際

的松茸（matsutake mushroom），如何在工業文明擾動過與遭荒廢的山林野地環境，悄悄生長。Anna Tsing 以多物種人類學的思維與路徑，探討松茸的採集與消費，相關的植物學知識、飲食文化、禮物交換與人情網絡、商品與市場經濟。並通過此討論資本主義與工業文明的發展，對於人類社會及自然環境的巨大衝擊。

對於 Tsing 深具啟發的前輩，同時活躍在人類學、STS、動物學研究的女性主義學者 Donna Haraway（2006）而言，多物種／跨物種（multi-species），更是她理論思維裡的關鍵詞。Haraway 強調，破除主體與客體，人與非人之間界線，接納多物種的世界，反思人類世，反思資本主義對這個世界與自然界所造成的巨大衝擊與影響。在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一書，作者 Haraway（2006）更深刻的提出，人類如何不再將自己當作中心，而是能與異質／異種共存共生，才有可能理解多物種之間錯綜複雜的多元關係，才能解決當前的生態危機。在此書中她有這麼一段，深具省思的話語，對於多物種人類學的研究，有相當的啟發，接納非人的異種、多物種，與其建立共生共存的親緣關係，才是一個可能的出口。

Kin is a wild category that all sorts of people do their best to domesticate...

What must be cut and what must be tied if multiple species flourishing on earth, including human and other-than-human being in the kinship, are to have a chance?（親屬是一個瘋狂的分類方式，讓所有人們都盡其所能地受到馴服。若多物種，包括人與其他

外於人類的物種，彼此都能作為親屬一起在地球上生長，那麼何類物種需要被排除或是可以連結，還會是如此明確嗎？)

(Haraway 2006: 2，翻譯是作者加上的)

臺灣也有新一代的人類學者，探究虱目魚 (Cheng [鄭肇祺] 2017, 2019)、福壽螺 (Tsai et al. 2016; Tsai 2019; 蔡晏霖 2019, 2020) 等不同物種對於農漁業文化，地方社會及區域的影響。鄭肇祺在研究虱目魚的過程中，因臺灣南部養殖漁業者在地智慧 (養土、養水、養魚)，啟發他進一步的探討 (微小) 動物與水的互動關係。藉以瞭解人和自然，如何共同生產水產生物及其環境、經濟、社會價值，並企圖回應環境人類學，多物種民族誌對於微觀世界的討論觀點。而通過實驗民族誌、紀錄片，以及本身同時是人類學者與友善小農的蔡晏霖，則針對福壽螺議題提出反思與福壽螺的關係。福壽螺能否作為同伴物種與接觸區，在臺灣社會經歷農工轉型期所興起的養殖風潮，農人、福壽螺與社會的共生與演變的關係又如何。

如前所述，以松茸、水中的微小動物、福壽螺為觀察與瞭解的主體，當人類學的研究，開始放下以人為中心的發問前提，才得以蹲下看見這些小小的其他有別於人的物種，理解與同理不同物種之間，以及物種與生態環境之間錯綜複雜的關聯，並才得以反照、反觀、反思，對人類自身與地方社會的理解。我們在馬來亞半島北部的檳城浮羅山背的人類學研究，也跨入多物種的探索與理解。探討榴槿在檳城浮羅山背，對於當地人群的生計、生活，與在地性的影響。多物種的共生，與客家及周邊族群之地方創生，地景文化間，可能有複雜的關聯，亟待進一步的探索。

## 四、1980 至 1990 年代浮羅的榴槿種植： 名種興起，行動者的共創與競爭

今日，浮羅山背作為檳島知名的榴槿產地，背後經歷了一段長期醞釀與發展的過程。之中，至今許多關於談及浮羅榴槿軼事時，時常會提及在 1980 年代時，葫蘆與紅蝦品種的發展故事（如張麗珠 2022；劉振儀 2024）。在此段落，我們將透過一位當時派駐於浮羅山背的客籍記者，對於當時浮羅山背榴槿產業的觀察與客家人在種植業中扮演的角色等，提供我們進入 40 年前，浮羅山背榴槿產業的樣貌。這些敘事，奠基於他當時在日常生活與工作間，緊密地沉浸於浮羅的在地肌理。透過回溯這段歷程，敘事與記憶，或許片段，但仍提供重要的參照角度，讓讀者得以進入 1980 年代乃至 1990 年代初，屬於榴槿小產區的浮羅山背的生動氛圍與圖像。這包括眾多種植者如何用心守護、推廣榴槿名種，期盼其不僅在檳島上流通，還得以傳播至其他州屬。<sup>11</sup> 這過程，也顯示了小農的榴槿產業深具集體共作的獨特性，包括一個名種／品種如何興起，技術如何習得與傳播，進而成為在地種植者爭相種植的品種。

在 1980 年代前期，當客家籍 A 先生<sup>12</sup>甫踏入記者工作時，當時華文報業，在檳城華人社會中深具影響力。一般可閱讀華文的華人，報紙是獲得日常生活訊息、政策發展的主要媒介。因緣際會下，1980 年代中期，A 先生派駐於浮羅山背所在的檳島西南區，負責報導浮羅山背與

11 透過這段 1980 年代的浮羅榴槿故事，本文無意突出當時行動者之間所自然展現的衝突與競爭，在些過程是商業社會中常有的現象。然透過敘事者的回憶與觀點，我們得以與在今日的敘事者的記憶、觀點。

12 基於研究倫理，本文所述之每位田野報導人的姓名皆經匿名處理。

美湖等地的新聞。作為報業記者，他因此有機會深入與細緻地探索浮羅地區的日常生活與人情社會。之中，榴槤，浮羅山背重要的經濟作物，也成為不斷出現在他日常生活中的種植作物。許多人情的連結，也透過對於榴槤的關注而來。連帶地，他也結識許多當時在浮羅榴槤種植業，活躍的各類行動者。某些人在之後也成為好友。

首先，他提及很多在浮羅的客家人從事種植業，是來自於當時英殖民政策下，需要引進勞工開墾浮羅的山區，便招攬了客家人入山的過程。

以前他們當年有園地，除了用買之外，更早以前是英殖民地政府，要引進華人來砍樹、來發展，然後引進客家人。客家人住在山上，很多是砍樹為生。很多像我的爺爺，我的爸爸，都做過這樣的工作。然後這些人呢，會砍樹了，就鼓勵他們去開發。看你能夠開到多少。然後你開了芭（山林）以後，你跟土地局……我們叫縣署，我們這裡的土地局，附屬於縣署。（A 先生 2022 年 10 月 30 日）

1980 年代，隨著當時湖內（Relau）農業研究局局長，對於農業發展的推動與用心，主辦幾場榴槤比賽，推廣在地榴槤種植的品質與名氣。直到現今，在檳城與馬來西亞各地，榴槤比賽仍是重要且盛行的方式，來分辨年度最佳品種與種植者（光明日報 2024）。而在當時，榴槤的價位仍相當低，園子卻需要園主在日常生活中花費許多勞力，辛勤看顧。也因此，政府期盼能透過比賽，讓更多品質佳的榴槤被看見，打響名號，激勵檳城榴槤種植業。

於是，A 先生得以躬逢其盛，參與比賽，並以記者對於在地網絡的敏銳度，觀察浮羅山背的榴槿業。這些比賽興起的榴槿熱潮（尤其是出現了兩個榴槿名種 — 葫蘆與紅蝦），引領浮羅種植業及其行動者的參與及競逐。他提到了榴槿比賽對於榴槿發展的意義，在於讓一些榴槿品種變得有知名度。而這背後，在當時的脈絡下，也包括 A 先生在內的記者，熱烈地報導。

榴槿種植業，你要推動的話，就要搞些活動，要打響名堂，就要有比賽。那時候開始有比賽。每一次比賽冠軍榴槿，才能繼續比賽。馬來文名字叫做特別獎（Hadiah Istimewa）。但是我們在採訪的時候，寫特別獎，也不能反映出它的身分嘛。我們就說榴槿王中之王。那個時候，（影星）周潤發做那個香港電視劇，不是有千王之王嗎？我們就說，榴槿王中之王囉。（A 先生 2022 年 10 月 30 日）

在那場比賽中，由客家人 W 先生所參賽的葫蘆與紅蝦，獲得特別獎。在華文報紙的推波助瀾下，這兩個榴槿品種，不僅受到檳城地方報紙的大篇幅報導，也透過全國版的新聞中放送，助長名氣。於是，葫蘆與紅蝦，不僅在檳城走紅，也紅到其他州屬，如，吉打州。據悉，W 先生具有相當強的榴槿鑑賞能力，從榴槿的外觀與氣味，便能夠知曉裡頭果肉的品質。這也顯示在眾多品種榴槿之中，得以從不同層次中辨識出榴槿的品質，是重要的技藝。當時，除了 W 外，其他活躍的行動者還包括一些在浮羅山背世代經營園坵的傳統家族，並長期鑽研榴槿種植技

術。如位於雙溪檳榔（Sungai Pinang）地區的某家族，在 80 年代之前，就開始培育與販賣榴槿種苗。

據 A 先生的理解，此家族在當時馬來西亞榴槿業中，可說是早期運用接枝技術來種植榴槿的先行者。至今，接枝技術已成為榴槿種植最普遍的方式。相對於種子種植，接枝能讓榴槿品種得以量產，並維持一定品質。接枝的技術，也經歷一段發展。當時，在 1980 年代，接枝仍採用較簡單的樹皮包覆技術，亦即擷取欲種植的榴槿品種，將其皮包覆在新的枝幹上，之後便逐漸配種而成。而在數十年的發展下，現今的接枝技術則愈加純熟，以樹枝插枝的方式接枝而成。在浮羅山背，葫蘆與紅蝦的走紅，也讓此家族原有的種苗生意，更上一層。其實，早在葫蘆與紅蝦造成熱潮之前，此家族在自家園坵，就種植許多榴槿老樹種，之中也包括紅蝦。而隨著葫蘆與紅蝦，透過比賽走紅後，此家族的種苗生意變得更好。外州的榴槿種植者，也紛紛來到檳城購買種苗，帶回各自州屬的園子裡種植。至今，在馬來西亞有些州屬，尤其是柔佛州，可見許多園子種植紅蝦，並成為一類常見品種。此即榴槿的有些品種，逐漸在外州生根的例子。

從這出現於浮羅山背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初期的榴槿熱潮，提供我們認識榴槿種植業，乃為眾多行動者共構而成的場域。政策方面包括當時農業局積極舉辦比賽，鼓勵本地種植業。再如具有榴槿品味與知識的行動者（如 W 先生），得以透過過人的榴槿品味，讓兩個品種在眾多競爭之下，脫穎而出。而在浮羅山背數代經營種苗的園主，透過原有的名氣，加速了葫蘆與紅蝦兩類苗種的販賣，也吸引來自外州的購買者，以及當時 A 先生所投身的華文報紙，具有相當大的社會影響力。

透過檳城與全國版面宣傳榴槿名種，造就彼此合力推波助瀾下的成果。

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浮羅山背，有不少參與榴槿種植的行動者是客家人，但也有潮州或福建人。根據觀察，A先生為華人榴槿種植業者的特性，下了一個註解：即賺錢（趨利），仍是驅動榴槿種植產業，得以持續進步、成長的原因。包括品種的選擇，及不斷研發技術（如接枝技術等），讓榴槿種植達到量的成長。

一旦報紙登出去，就全國出名囉！這個榴槿比賽啦，不但推動了名種榴槿，就是說他比賽拿了冠軍，然後農業來講，他有一班發燒友的。那些人研究，有一些，不是說為了生活去做的，他們都是以金錢為出發點的，我發現啦，我這樣多年採訪經驗。他們認為，什麼可以賺錢的農作物，他們之間就很高興去推動。（A先生2022年10月30日）

榴槿熱潮也反映了榴槿產業的獨特性－透過行動者集體共作，擴大品種的市場價值。一個名種之所以盛行，需要有足夠的產量流通於市場，讓此品種為更多人認識與消費，進而反映於高價格。當年在這股浮羅榴槿的熱潮中，也曾造成行動者間的競爭與緊張關係。其中一個小插曲，是來自經營苗種培育的家族與W先生之間對於榴槿種苗的認知差異。此家族在葫蘆與紅蝦走紅前，即以專注於培育與販賣各種榴槿種苗聞名。葫蘆與紅蝦兩個品種，則是透過W先生參與比賽而走紅。即使W先生曾希望能夠掌握靠自己出名的種苗，然畢竟榴槿的品種與所有權，是相當難由一個人控制與把持的，最終也不了了之。這個例子，也

道出了榴槿的有趣之處。榴槿名種的名氣，相當容易從一個地區，擴展到全國，並成為各地榴槿業者爭相種植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競爭關係。然而，從另一角度而言，正是由於大量的種植，又拓展了此品種的市場，為更多食客所知與喜愛，進而鞏固此品種的價格。再者，榴槿的技術也難以完全被壟斷，尤其當前的接枝技術已經頗為純熟與普遍。而且同樣的榴槿品種，對應不同的土壤與氣候，存在著更細節的種植知識及其間的差異。因而榴槿的種植，也仰賴種植者自身的探索，實驗，與彼此的相互學習。這也回到前述所提及的榴槿獨特性——一個品種的盛行，需仰賴種植者彼此共作，才能將市場擴大。

回到浮羅熱潮的後續，葫蘆與紅蝦的熱潮，大約到 90 年代初就逐漸消退。這來自於多重原因，包括政策力道的轉變，榴槿比賽到 90 年代即不再舉辦。另，市場上對兩個品種大量種植及收購的現象，也已日漸飽和。A 先生如此描述這個轉變，「... 活躍到 90 年代初。90 年代初因為榴槿比賽熱潮，已經過去了。人家應該買的，大量收購的都買去了。接著就是滯銷了，沒有這樣銷了囉！賺也賺到了囉」。

## 五、浮羅榴槿園的當代人文地景： 客家及其周邊族裔、經營、技術與韌性

本文前一節，透過 1980 至 1990 年代，浮羅山背出現的兩個榴槿名種，傳達榴槿的獨特性，來自於一個品種的盛行，仰賴種植者彼此共作，才能將市場擴大。延續上一世紀末，浮羅榴槿種植與市場之起伏的整體氛圍裡，本節將轉入較微觀的榴槿園子與小園主的民族誌紀錄。我們將

以三個例子來闡述，榴槤園作為小農園主日常生活投注勞動心力的微世界，充滿人與榴槤樹、其他物種、地理、生態環境、技術、知識與盼望的緊密纏繞。再者，本節的榴槤園子與小農園主民族誌，也將揭示其中所蘊含的族裔景觀。浮羅山背是檳島最主要客家人聚居處，我們的研究所探訪的園主，也有多位是客家的背景。通過 2021 年至 2023 年的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我們探訪了數個各有特色的園子。本文以兩位客家籍園主，一位福州籍園主，作為主要的民族誌敘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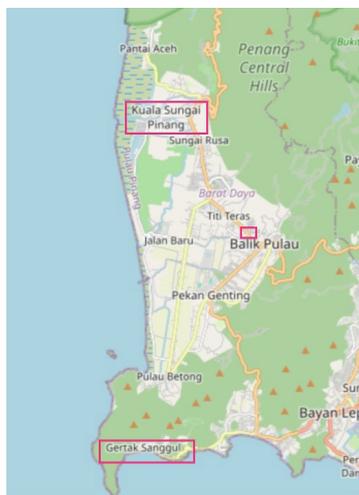


圖 11 浮羅山背與周圍地域的地圖

說明：紅色部分為受訪者所在的區域（筆者所加）。

資料來源：OpenStreetMap（2024b）<sup>13</sup>

### （一）較高山頭的榴槤園與園主：引入科技種植榴槤的第四代客家天主教徒

D 大哥（1960 年 -）的榴槤園，坐落於較高的山頭，面積約有 10

13 此資料來源至 OpenStreetMap 的公開資料授權，特此感謝。

多英畝。作為一個榴槤園主，D 大哥不僅專精於榴槤的種植技術，同時也是浮羅當地天主教客語經文念誦的領唱者，以及熱誠的客家文化與家族史的敘事者。他的家族史敘事為我們展現浮羅山背客家人移居與多元族群通婚的社會紋理。D 大哥家族的原鄉，來自廣東惠州淡水鎮，此地屬於客家區。大約在 19 世紀末期，曾祖父從惠州經檳城喬治市，來到浮羅山背。曾祖父因為辛勤工作，受人介紹，認識了生長於浮羅當地，並信仰天主教的曾祖母。曾祖母在天主堂裡的修女院成長。當時修女院收留很多浮羅當地華人女孩。D 大哥說，這與華人移墾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有關，許多浮羅的家庭有太多孩子，便會將女孩出養。

曾祖父認識曾祖母後，也開始信仰天主教。到 D 大哥這一代，已是第四代天主教徒。整體而言，浮羅山背的客家人，多數信仰天主教，並以市區的天主堂為主要禮拜地點。即使直到現今，浮羅山背地區信仰天主教的人數，較為減少，然天主教仍是浮羅山背客家人主要的信仰。每逢禮拜日，在天主堂內，仍會見到許多客家人參與，彼此以客語交談。D 大哥認為，浮羅客家人信仰天主教的歷史因素，係因客家人早期大多居住於山林間，呈現散居狀態。天主教的進入，讓這裡的客家族群產生了凝聚與依歸的認同感。

D 大哥家族在家戶內所使用的語言，浮現跨族裔方言群交織的系譜關係。曾祖父母彼此以廣東淡水話溝通。祖母家族則擁有土生華人的背景，屬於泰國與緬甸那一帶通婚的後代。「我所看到的是，我從小，父母講客家話，我也是跟著講。但是我的祖父，不是講客家話，他是說淡水話」。而父親的客語，則是由有土生華人背景的祖母，所教導的。D 大哥的母親，是來自豐順的客家人，會使用客語。這讓 D 大哥，從小至今都說客語。

當年曾祖父，幫人打工，透過他人的介紹，以自己的積蓄，買了第一座園子。當時的園子，以種植香料為主，例如丁香、荳蔻、椰子、檳榔等。D 大哥現在種植的園子，是家族早年向一個富有的娘惹家庭買下來的。此園子位於頗高的山頭。D 大哥說，早期在浮羅的富有人家，會買一個個山頭。並將他們的大宅建在山裡頭。我們去拜訪 D 大哥的園子，原地主／娘惹家庭所建的大宅也還在（圖 12）。D 大哥小時候就在這裡長大。木造建築的外觀，即使有著歲月痕跡，但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木造結構，也可以看出當時家庭的富裕狀態。園子內交織著多條陡峭的山路，需要相當強的體力與熟稔的技術，才能夠在園子裡穿梭。從小就在園子裡跑來跑去的 D 大哥，早就習慣這樣的山路與日常。



圖 12 榴槤園中的老房子

說明：a.D 大哥家族在浮羅山背榴槤園中的老木板屋。家族世代信仰天主教的背景，在屋內的一些擺設中可感受到。

b. 作者拍攝於 2023 年 6 月 24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年輕時，D 大哥曾經在外工作過。這些經驗，讓他對於榴槤園的種植，得以尋求較多的突破。包括他的榴槤園，相較於其他園子，使用較

多科技的輔助。他相信，透過資源的引入與學習創新的知識，才有辦法讓園子的經營管理，愈來愈好。園子裡有一個「控制中心」，能夠為園子裡大部分坐落於斜坡上，並且長得高聳的榴槿樹，得到良好的肥料與農藥（圖 13）。是故相對於浮羅當地其他榴槿園，榴槿產季大多只有一季，D 大哥透過固定施肥，每年穩定地有兩季收成。



圖 13 較高山頭的榴槿園

說明：a. D 大哥位於浮羅山背高山上的園子。高山地形使得園子內許多榴槿樹都種植在陡坡上，看顧特別不容易，也必須透過科技的適度引入來協助施肥。

b. 作者拍攝於 2023 年 6 月 24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天主教對於 D 大哥家族有深遠的影響，成為他與家庭之間日常生活的準則，如十誡，這一些提醒，也成為他在經營榴槿種植隱含的準則。相對於許多園子，仍是屬於家族內部的經營方式，D 大哥的榴槿園，無論在管理或者販賣榴槿，則相當明顯地引入較多的外部合作。這部分。D 大哥不斷提醒說，需要結合眾人之力才能共享資源，他願意將部分管

理層面，如行銷，交給專業的經營團隊合作。而他對於客家人在浮羅的發展史，尤其是從種植香料開始，即積極參與的世界史，乃至於現今許多客家人投入榴連種植，都有相當的理解，並且不吝惜將這些知識，分享他人。甚至對於榴槿種植的知識，也拍成短影片供人觀看瞭解。幾年前由臺灣公視出資的「南國啟示錄」的紀錄片拍攝，因緣際會之下，D大哥也成為其中一個受訪者，他在影片中分享了自身身為客家人與榴槿種植園主的故事。如此公眾化的經營自己理念，也或許是他不斷思索自身、客家族群與種植，創新與傳承的方式。

## **（二）雙溪檳榔的有機榴槿園與福州籍園主：從零到有，轉向有機**

浮羅山背的雙溪檳榔地區（Sungai Pinang），普遍被視為浮羅山背裡，相當優良的榴槿產區。根據 A 先生的描述，一些 1980 年代有名的榴槿種植者，許多都來自此區。雙溪檳榔地區擁有相當多的優勢，如鄰近溪流、大石頭地、相對於一些園子位於山區較內陸，此區交通較方便等（圖 14、圖 15）。許多知名的榴槿園，皆座落於此區，包括 H 先生的有機榴槿園。



圖 14 大石頭與榴槿樹

說明：a. 浮羅山背的雙溪檳榔區域，普遍公認為優質的榴槿產區。路邊時常可見大石頭及老的鄉村榴槿樹種。  
b. 作者拍攝於 2022 年 9 月 17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15 榴槿老樹

說明：a. 浮羅山背的雙溪檳榔區域，小農園主栽種的榴槿老樹品種。  
b. 作者拍攝於 2022 年 9 月 17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目前正值壯年的 H 先生（1970 年 -），是小農榴槿園的第三代經營者。他的家族祖籍為福州人，然在公公（祖父）於數十年前開始購置土地時，就與浮羅當地客家人常有往來，互動緊密。H 先生的敘事裡，描述了浮羅山背的山林種植，從香料到榴槿的轉變。在英殖民時期，浮羅山背山林中所盛產的香料，如丁香與荳蔻等，是重要的外銷商品。1950 年代馬來西亞獨立後，隨著區域間其他國家的盛產與競爭，丁香與荳蔻價格逐漸下降。如此劇烈的轉變，使得浮羅山背地區的種植面對挑戰，而出現一波轉型。<sup>14</sup>

H 先生的公公，當時在浮羅的傳統咖啡店（kopitiam）<sup>15</sup> 裡，賣著自製的麵條與包子。面對香料價格大幅跌落，公公與其他多數為客家籍的種植園主，彼此聊天及商討，希望為浮羅經濟作物的種植，找出一條可行的道路。即使他的公公為福州人，在當時也與浮羅占大多數的客家人

14 此部分的歷史敘述，關於種植物從香料乃至榴槿的轉型，來自於受訪者 H 先生的分享。

15 馬來西亞的傳統咖啡店（kopitiam），盛行於城市或者鄉下，是人們日常生活重要的公共空間，可以閒聊家常或者暢談國家大事。

打成一片。H 先生描述當時華人之間的互動，相對比今日緊密，跨方言群間的交流，相當常見。除了華人跨方言群間的互動外，公公當年開咖啡店辛勤經營小生意時，也時常會提到日常頻繁的跨族群互動。公公自身謹記跨族群溝通時，需維持尊重及向善之心。這些教導深刻地影響 H 先生的家族教育，數代流傳，並成為他從事榴槿種植業，時刻放在心上的教誨。

之後，就是英國離開了我們大馬，很自然的就是英國，他們可能不跟你買，對嗎？丁香和荳蔻的價錢就突然滑下，一滑下的話就，像我公公本身，因為他們在咖啡店都會談嘛。一滑下，華人跟華人，以前的華人比較不自私啦，會互相的商討，怎麼做，怎麼才能有另外的出路。那陣子就看到說，像我公公本身，他會種榴槿，他會看到說，最主要的，榴槿，馬來人在吃啦。（H 先生 2023 年 4 月 9 日）

像我公公之前交代我爸爸，我們會傳下去。例如，我們做出來的東西，肯定我們吃的好吃，要吃。不要做那些有的沒有的。第一。那如果是馬來人的話，我們也是要尊重他們的風俗，他們不能吃肉的。所以我們就做那個包，炊的時候還是什麼時候，Kaya 我們都是用另外一個（指蒸籠）。這以前都是我公公做事的方法。（H 先生 2023 年 4 月 9 日）

經歷過二戰的公公，在戰後，決定開始購置土地。那是從一毛一毛

開始累積與湊出來的過程。當時，公公買下土地，並非為了投資，而是經歷過二戰與日本侵略的他，深知留下一塊地，靠自己的力量種東西來吃，總有辦法存活。這也呈現了在 H 先生的公公那個世代的浮羅人，重視自食其力與透過耕作維生的能力。H 先生從小就知道公公與父母，一路窮過來，並且辛苦經營與守著榴槤園的過程。其實，在他父母的時代，一年只有一季榴槤，價格很低，單靠經營榴槤園是無法養活一家人的。這是當時榴槤園普遍經營的處境。為了養家，父母當時也需要在外面打工。直到現在，在榴槤季之外，經營其他工作，仍舊是許多小農榴槤園種植者的寫照。

H 先生在 2010 年，決定離開之前在馬來西亞其他州所從事的運輸工作，回家接手榴槤園。這項決定是不容易的過程，然因父母年邁，榴槤園的看顧，時常需要爬上爬下，這對年邁父親而言，是個吃力與危險的工作。父母一方面尊重他在外工作的選擇，一方面也擔心祖傳榴槤園沒有人承接的問題。經營榴槤園，是吃力不討好的。即使一些榴槤名種，可以賣上好價錢，然而，榴槤園的看顧，需要投入一整年日常生活的勞力與心力。

當中的挑戰，也包括榴槤樹種植過程中，容易出現病蟲害。H 先生在接手榴槤園幾年後，逐漸對榴槤種植技術變得熟稔後，決定轉種有機榴槤。這條路，是一個漫長的試驗過程（圖 16、圖 17）。當時選擇轉種有機，主要原因在於市場區隔。2010 年代初期，中國投資的化學肥料，開始普遍為在地種植者所用。如此大量的化學種植帶來了高產量，將如何得以競爭？於是，H 先生決定朝向有機種植，期盼能夠建立自家的名聲，以榴槤的品質，代替席捲而來的量。幸好，努力了幾年，發現這是

一個緩慢卻可行的方向。這也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逐漸地，許多能夠分辨出有機榴槤口感與一般化學肥料榴槤種植有所不同的客人，便不斷地回來浮羅，找他家種的榴槤。這之中包括許多來自國外的客人，如新加坡人。種植有機榴槤的道路，充滿各種挑戰與困惑。無論是昂貴的肥料價格，或是頭痛的病蟲害問題等，都必須以非典型的方式處理。這過程中，知識與技術，都是不斷自我實驗出來的。他也曾尋求農業部的幫忙，並建立了一些聯繫。在某些關鍵時刻，他也獲得技術上的協助，甚至是試驗。如他們會帶來只能在天然環境生長的銀蜂，讓 H 先生養養看。一開始雖有些困難，但隨著更加了解跨物種間的關係與平衡，現在 H 先生的園子裡，已可看到一間間銀蜂的家。這些來自多元物種間的相互影響，以及對於大自然環境的友善與回餽，都是 H 先生採行有機種植榴槤後，才認識與體會的多物種世界。



圖 16 有機榴槤園

說明：a.H 先生家族的榴槤園，裏頭種了許多榴槤以外的植物，呈現有機、沒有刻意規劃的樣貌。

b. 作者拍攝於 2023 年 4 月 9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17 榴槤園主的老屋

說明：a.H 先生家族的老屋，坐落於園子的上層。前有寬闊平坦的地，供家人活動，及處理園子所收成之果實的地方。

b. 作者拍攝於 2023 年 4 月 9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而有機榴槤是如何與一般榴槤有所差異？H 先生描述著，有機榴槤在口感上較為爽口，不會造成燥熱。「有機肥土壤種出來的榴槤，你吃

了，會很爽口，很容易接受的。像不愛吃榴槿的，他吃了有機榴槿，皮膚不會覺得癢。現在有些榴槿，你吃下去會覺得癢癢。那是化學和有機，在這邊的區分。」

至於，整體而言，Balik Pulau 的榴槿，究竟具備什麼樣的獨特性，得以與其他州屬生產的榴槿競爭？大概就是浮羅榴槿產區偏小，因而每片土地與榴槿樹，都會受到園主較細膩的照顧與在意品質。

那其實到現在我們知道是說，會吃榴槿的人，都會選品質。像我本身在做，就是 Balik Pulau 到現在為止，還有很多本地人，他們都會選擇吃榴槿。如果 Balik Pulau 的榴槿沒有，他們寧願不吃。新加坡人也是會知道，吃榴槿，就是直接來 Balik Pulau 這裡。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為 Balik Pulau 都是小農地，我們的農作量比較少，比較小，然後比較重視品質。品質是怎麼控制的呢，就是你最主要，不要給榴槿整大堆在一起。我們都會盡量收割果、勾果，哪個形狀的是最好，哪個形狀出來，才有它的味道。我們都會注意到這種細節，然後，of course，因為人工上的問題，很多都是很難。外面負責大量收購的，他們都不理品質。（H 先生 2023 年 4 月 9 日）

浮羅山背的地理環境條件，賦予在地的榴槿種植，具備與其他州屬不大一樣的特質。其中，也包括了不同物種，在土地與大石頭間穿梭的情景。

所以講起來，為什麼 British 會在這裡種丁香還有荳蔻？另外一個（因素）是海風影響。所以榴槤也是靠海風影響。在 Balik Pulau，因為我們有海風。所以我們最大因素，就是我們不集水，而是用清潔的水。榴槤根很喜歡藏在石頭下面。你在上面一層放著 concrete 石灰，還是什麼，它會將這個石頭拿起來，因為它喜歡藏在下面（指根）。其實石頭本身也會。真正的原因是，因為蚯蚓嘛。蚯蚓喜歡冷嘛，它都會跑進石頭旁邊睡覺，還是找東西吃。所以如果我們要去釣魚，都會在石頭旁邊找蚯蚓。它都在那一帶嘛。所以在那一帶可以傳播有機肥料，蚯蚓會跑去那一帶藏著。榴槤的根，也會去那裏吸收肥料，然後同一時間，它會慢慢坐在那邊，因為裡面是冷的。然後在裡面的話，它（指榴槤的樹根）就從小根、粗根到大根，這樣子的成長。（H 先生 2023 年 4 月 9 日）

榴槤園的照顧，是一段長期的過程。在 H 先生的敘事裡，包含了祖父輩以來在小本生意的細節處，以關注與尊重差異，建立跨族群互動的經營理念。在面對中國市場的崛起與化學肥料的引進，H 先生將轉型有機的艱難，通過小園主的意志與行動，帶來轉變。並也由此凸顯了小農、小園子，以及雙溪檳榔獨特的地理條件，共同創造浮羅山背榴槤園子的獨特性。最後也最有意思的部分，是 H 先生以極為生動立體的透視法，為我們展開一幅動人的畫作－榴槤樹的根，由小到大緩慢成長的過程裡，緊密依靠棲居於泥土下方，石塊邊緣濕冷角落的蚯蚓，為其重要的媒介，帶入有機肥。如此多感官與多物種的榴槤種植物語，H 先生的敘

事闡述了雙溪檳榔榴槿園種植文化裡，不可分的風土與細膩的技術及觀察。



圖 18 榴槿園子裡的銀蜂

說明：a.H 先生家族園子裡飼養的銀蜂。  
b. 作者拍攝於 2023 年 4 月 9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 （三）美湖的榴槿園與客家籍種植者：種植知識的學習與實踐

透過浮羅的朋友介紹，我們認識了位於浮羅周圍市鎮美湖地區（Gertak Sanggul）的榴槿種植者，試圖探索浮羅周圍地區的小農榴槿種植的樣貌。B 先生（1960s -）的家族是定居於美湖第三代的客家人。美湖位於檳島南端沿海，是一個人數約有一至兩千人的小村落。美湖現今在地的產業，主要包括榴槿種植與捕魚。B 先生父親的榴槿園，大約有 10 英畝。這樣的規模大小，似乎不算太小，也大約是一般美湖人所擁有的種植園規模。然而，B 先生父親留下的土地，就如許多美湖在地的居民一般，在近 20 年逐漸賣出。這些土地多為本地資本或外資的大

集團所收購（如日本的 Jaya Jusco<sup>16</sup> 集團等）。有時，這些大集團收購後，還會持續轉手。

在過去，B 先生其實並未替父親打理榴槤園。年輕時，B 先生選擇外出工作。因工作性質，他時常來回奔波於不同州屬間。家裡的榴槤園，主要由哥哥負責打理與看顧。直到 10 多年前，他開始替親戚打理他們的榴槤園。種植園面積大約在 10 英畝以下。B 先生是主要的種植者，另外有兩個工人幫忙。當年他剛接手管理時，這裡是一大片看不見天日的樹林。之後在 B 先生的努力，逐漸開墾闢路。至今，園子裡的基礎設施，如通往園子的產業道路等，有顯著的提升。看得出來，在道路的整建上，花費了相當大的人力與物力（圖 19、圖 20）。



圖 19 榴槤老樹

說明：a. 園子裡珍貴的榴槤老樹，都受到細心的照料。  
b. 作者拍攝於 2023 年 9 月 18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20 榴槤園的道路

說明：a. B 先生幫忙打理的園子，內部的道路，花了數年的時間，才逐步修整好。  
b. 作者拍攝於 2023 年 9 月 18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榴槤園的看顧，需要投入很多日常生活的勞動工作。而種植的知

16 Jusco 是日本零售公司，他在馬來西亞是其中一個著名的銷售百貨集團。關於他在馬來西亞的軌跡，可參考維基百科的描述（Wikimedia 2024）。

識，也都是 B 先生在這些年間，透過自身的實踐，或者向別人學習，逐漸摸索出來。這些各方來的知識，最終都需要揉雜成符合自身種植園的條件，包括各自獨特的地理環境、經濟成本等。很多時候，這些細緻的經驗，如施肥的時機與次數等，都來自各小農榴槿種植者，考量各自的條件而生，尤其是經濟條件。相對於種子的種植，插枝方式種植出來的榴槿果實，在產量與品種的質量穩定許多。另外，通過種子的耕種，果實收成，需要更長的時間，大約慢了三年。因此在顧及果實品質與效率的眾多因素下，插枝法是最穩定的方式。

而對於一個完全以銷售榴槿為收入來源的小農榴槿園<sup>17</sup>而言，榴槿品種的選擇，相當重要。這些都實際地牽涉到，種植榴槿名種可獲得的實際收益。畢竟，對於專業的榴槿種植者而言，如此辛苦的年年守護榴槿，期盼的便是有好價錢。在 B 先生所照料的種植園裡，主要種植的就是在馬來西亞國內與外銷市場上，出名的貓山王與黑刺，以及新的品種，松鼠王。

根據 B 先生的觀察，榴槿品種的遞嬗，大概幾十年有機會轉變一次。但是他認為，貓山王與黑刺，大約再流行數十年應該沒有問題。在交談中，B 先生也不斷提到，榴槿品種的價值，作為一種集體創造的觀念。也就是，當特定榴槿的品種，得以愈多人種植，並且銷售到更多地方與市場，那麼品質良好的榴槿品種，也才得以持續地擁有較高價位，與維持其在市場受歡迎的程度。換言之，這來自於種植者、銷售者、市場，與消費者之間，所構成的網絡與互動關係。

這一點，似乎打破了過往覺得消費市場中，物以稀為貴的道理。一

17 榴槿園的經營種類相當多元，而這也多少決定了榴槿園所種植的品種等。相對於浮羅許多榴槿小農園主，主要採取結合民宿等複合式型態來經營種植園，B 先生所經營的榴槿園，完全以榴槿種植為收入來源，其所種的品種，就更為重要。

個提問是，那麼，若是品質極為優良的榴槿品種，產量不多，價格也會提不起來嗎？他進一步解釋，就算一個品種的品質優良，但畢竟如果量少，無法銷售到很遠的地方，那麼，別人買不到，價值自然就無法太高。而這形成一種不斷增加的循環，當價格愈高，便有愈多人願意栽種；而一旦種植的人多，便也使得更多人能夠吃到，也進而創造出更大的價值。以此循環。這樣的特性，顯示出榴槿這類深具季節性水果，及在日常生活中，有些近似於奢侈品特性的市場。他明快地說，「榴槿樹，愈多人種植，就愈有價值。」

B 先生進一步指出，浮羅流傳著一種說法，是關於檳城兩種傳統上的榴槿好品種——葫蘆與紅蝦。即使它們品質不錯，卻因為無法「賣過海」，銷售範圍主要停留在島上。從商業角度而言，能否超越檳島的界線，是一個指標。更有甚者，一般種植園也是具有商業敏感度與現實考量的。從葫蘆與紅蝦的例子，我們也可看到榴槿作為一種經濟作物的特性，及浮羅山背在馬來西亞視野下，作為一個相對小規模產區，所面臨的挑戰。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我在浮羅聽他們講：「檳城有兩種榴槿，是賣不過海的」。它們的問題是品質好，但賣不多嘛。在本島就給人吃的七七八八，要過去北海比較難。很多人啊，貓山王出名了，很多人就把葫蘆、紅蝦的榴槿樹砍掉，要來接新的枝種（貓山王），因為它們的價值相差很多。（B 先生 2022 年 9 月 15 日）

而幾位受訪者的描述中，有時也提及榴槿種植園的經營具有跨族群

的差異。

#### (四) 浮羅華人與馬來人小農園主的差異：跨族群觀點

根據本文受訪者的觀點，浮羅山背的小農園主經營方式，存在著馬來人與華人的跨族群文化差異。讓我們先回到記者 A 的敘事。他曾提及華人推廣榴槿種植，主要來自於「趨利」。然而，在他敘述語境中，「趨利」並不全然是負面的評價，而是商業運作下的必然，並可視為一股進步的動力。無論談到榴槿技術的創新，或在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間，浮羅榴槿熱潮下所帶動的行動者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都讓種植園成為諸多行動者投入，彼此競爭品種的優劣與提升技術，並也因此共同擴大市場的供需。

當 A 先生在描述他較熟悉的華人小農榴槿園主及種植者時，時常以浮羅的馬來族群種植者，作為一個參照點。1980 年代起，當葫蘆與紅蝦出名，引起華人小農園主爭相種植時，浮羅山背在地的馬來族群種植者的反應為何？普遍而言，浮羅當地的馬來族群種植園主，似乎存在較為平靜與淡泊的狀態。也許馬來鄉村的榴槿園，也會追逐名種榴槿，但不若當時的華人種植園，傾向於短期間內將絕大部分的樹種砍掉，轉而追逐名種榴槿的種植。馬來鄉村的榴槿園，大都維持較天然的狀態，等待著榴槿老樹，生長出各形各異，不同狀態與口味的鄉村榴槿。

因為你名種出來，你看後來華人的園坵，你要找 Kampung 榴槿（鄉村種的榴槿）都很少，是不是？你能夠找到一些大大粒，奇形怪狀的，都是馬來 Kampung 的。他們不長進，不要改革，

也不管經濟利益，只要我家裏有個園坵，有種榴槤就算了。他們不是說一定要去找名種，有種幾棵就可以。華人就不同喔。以前我們就有丁香，有荳蔻，都把它們砍掉。榴槤樹也把它們砍掉，全部拿來種名種榴槤。（A 先生 2022 年 10 月 30 日）

雙溪檳榔有機榴槤小農園主 H 先生的敘事，也提及華人與馬來族群種植者之間的差異。H 先生提到自己成長經驗中，當公公還在，看到家裡的園子，從種植橡膠，逐漸轉變成榴槤園的過程。無論施肥、灑農藥、安排勞動人力與經濟成本的多寡等，華人經營榴槤園，在日常生活中所投注的各種心力，都來自精密的計算。這些面向，大抵構成華人與馬來人榴槤種植技藝的差異。

其實我公公是有請人家在做。我所謂的森林，就是因為它有樹膠芭嘛。但你請工人的話，他不會這樣，怎麼講，專心的跟你做。我公公本身都是打理店面嘛，他沒有那個時間真正去顧。所以以前的顧園做法哩，他不會說顧得很滿。來到你家前面，他就來那邊坐著，坐坐坐，就好像做工了。之後領了薪水，就跑了。他們都是這樣的做法。然後以前所謂的園，就是現在所謂馬來人的園。因為馬來人還是在做園的，就是裡面還是有雜草，雜樹。對啊，如果你去馬來人的園，就會看到有雜草，有雜樹。那現在有些人講我的園，也是有雜草雜樹。但問題是，（在我的有機園子），這些所謂的雜樹，是花類雜樹，不是那些大棵樹的雜樹。（H 先生 2023 年 4 月 9 日）

如果你不專心地顧，因為像有些人，會打到草，藥用的很濃那種。他是將所有的草，都除掉。但問題是，如果草不生，土壤就不肥沃。這是一個很基本的道理。那馬來人本身，他很少去放肥。肥料蠻貴的，他下肥比較少。他也是靠這些草，雜樹幫忙遮陰。但是問題就在這裏了。他們（馬來人）不了解一個心態，就是如果你那些雜樹存在的話，對嗎，雜樹存在的話，雜樹是跟你搶肥料。它是直接跟你搶肥料的。這個問題存在了。然後他們要砍掉雜樹，也是一個問題。因為你要砍掉棗樹，你要電鋸啊。鋸完了之後，你也是燒，要在那個地方燒，燒死那個樹。……對他們來講（過程繁複），所以他們就沒有什麼去理會了。（H先生 2023年4月9日）

然後另外一個是平常時間。因為榴槤季節，你能賺多少，也就是賺那個幾十千吧，對嗎？那平常時間他們都不去打理園，就會造成這個問題。對我們（華人）來講，我們差不多一天24個鐘頭都在園子，差不多每一天都在園子，365天都在園子。都是在做園的事情，那種你才可以打理出來。要不然的話，他們都是外面有一份工作。那其實很多做農的華人，也是在外面打工。另外有一份工作的。所以他們就比較沒有真正去顧園子了。（H先生 2023年4月9日）

## 五、結語：族群韌性與小農榴槿園子的傳承、知識與技術

本文透過客家方言群為主，福州方言群為輔的幾位浮羅山背小農榴槿園主，及種植者的生命史敘事，並結合走訪小農榴槿園的民族誌田野及參與觀察，探索與理解他們各自家族的族裔背景，及榴槿園的種植知識、技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開。我們也透過一位在 1980 年代就開始深入浮羅山背在地肌理的客家籍記者，從當年一場比賽為起始，說起浮羅山背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葫蘆與紅蝦熱潮的興起與淡去。以此，我們看到浮羅山背榴槿產業發展的一段過程，也攸關不同行動者之間的競爭、合作，共同創造榴槿消費市場等。

### （一）浮羅山背獨特的地理條件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所述及的小園子經營特色，必須放置在浮羅山背獨特的地理條件來理解。相對於西馬其他州屬（如彭亨、柔佛），檳島可農作利用的土地，較為稀少。因而浮羅山背的榴槿種植，往往位處山區陡坡，這讓採收過程變得更加艱辛，而園子也以小規模為主（檳城常見的榴槿園，多為 20 英畝以下）。連帶著檳城小園子也朝向更加精緻的種植園路線來發展，如強調不同品種的特色。這與彭亨、柔佛等其他州屬，逐漸被大規模種植園取代，傾向以貓山王、黑刺等單一名種為主，並進行大量外銷，而有所差異。此外，小農榴槿園主間存在的彈性與動態網絡，也得以讓園主與種植者間，探索與更新榴槿種植知識、

遭遇的問題與榴槿的時價等。這些社群網絡，往往奠基於實際的日常生活與人際往來。如一些小農園主會提及，在傳統咖啡店（kopitiam），或中間商收貨時，都會相遇閒聊彼此種植近況。而當前通過網路的臉書等社群媒體的群組，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在地的小農榴槿產業的發展。

## （二）小農種植園主的技術與日常實踐

本文所呈現的小農榴槿種植園主，如何透過習得的技術，轉化成各自榴槿園適合的特色、方向，都牽涉較為實際知識的部分。如 H 先生轉入有機種植時，經過不斷地嘗試與市場定位。D 大哥則是積極嘗試科技，解決自己榴槿園位居較高山頭的陡坡，需要施肥與澆水的挑戰。B 先生則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透過向其他種植者請益，並將這些知識，在自己看顧的園子中嘗試，汲取失敗經驗，下次再挑整。這些都展現著小農園主，不辭辛勞地兼顧知識與技藝的過程，成就一次一次的收成。而這部分，通常也牽涉到園子裡，不同世代種植間經驗的差異、承襲與創新，在這過程中，個人、族群與地方社會，及社群的韌性，由此展開。

三位榴槿園主／種植者本身的生命史與工作職涯，具有類似的移動路徑。年輕時，他們都曾經在外生活工作過一段時間，往往具有跨州屬的外地工作經驗。到了中壯年，決定回來浮羅傳承家裡的園子，或者協助親戚種植榴槿。而當這些園主／種植者，具備其他城市的工作經驗，再返回家鄉接手榴槿園時，也讓他們對榴槿園的創新實踐，有更多的想法與資源投入。這些歷程是普遍的，也顯示經營一個需投入相當勞力與經濟的榴槿園，來養活家庭，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我們在與 H 先生

訪談的過程中，他提到在父母的年代，榴槿的價格較低，父母平常需要在外打工，才能養活一家。到了他這一代，即使現榴槿市場價格上漲，他的園子也有些名氣。但若僅是靠園子的收入，也無法養活他與弟弟兩個家庭。這顯示出，小農榴槿園種植者所需花費的勞力、經濟與時間成本，是相當大的。整體而言，通過前述民族誌田野裡園主／種植者的敘事，本文試圖勾勒浮羅山背在地行動者的榴槿種植過程，地景轉變、族群與在地韌性。

### （三）客家、家族史、西方基督宗教，及其與種植園經營的關聯

本文所進入的場域，是 200 多年來，在華人方言群的視野下，客家人從華南遷移至英殖民的檳城。在浮羅山背山林之中，聚居數代，並逐漸耕耘成一座座的種植園。此移墾的脈絡與客家族群文化，普見的離散特性是相關的。再者本文所探討的小農園子的經營，也凸顯家族史的意義，乃至宗教的影響力。首先浮羅山背地區的小農園主，多數是承接家族世代經營的榴槿園。他們本著各自的經營理念，期盼能將榴槿園的生產，帶往較好的收益，及透過創新，讓園子的種植與生產得以延續。但他們的經營哲學，往往來自家族世代教養的文化傳統。福州籍的 H 先生，謹記祖父過往賣包子的哲學，尊重馬來人的飲食傳統與禁忌等。作為天主教客家家族的第四代，深植於 D 大哥內心的守則，是來自惠州淡水的祖輩，來到浮羅山背墾殖的辛苦歷程。對 D 大哥而言，客家人由華南遷移到浮羅山區墾殖、拓展的歷史理解，與天主教嚴謹自律的誠條，一樣重要。D 大哥身兼榴槿種植園主，與浮羅百年天主堂當前的以客語

唸誦天主教經文及詩歌的重要領唱者。他強調與自身族群認同緊密關聯的是，跨世代客家家族的遷移墾殖歷史，以及從小成長於天主教家庭、家族及社群的嚴謹教義。它們不僅在思想上，內化成 D 大哥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的原則，也與他強調誠懇、自律、熱誠，以及重視知識與技術的榴槿種植及經營果農事業的道理相通。

從家族移墾史到家族的信教史，或許這些深植內心的傳統，不會時時刻刻在日常生活中被提起，但儼然成為他們心中，經營榴槿園子的內在哲學，並也成為世代傳承的一部分。這些細緻的家庭及家族的傳統與族群認同，不僅展現於浮羅山區的客家天主教社群，以及浮羅山背南側美湖小鎮的客家人及其家庭，也浮現於及浮羅雙溪檳榔的第三代的福州人及其家族。後者（H 先生）自公公那代的日常生活，即具有跨方言群（福州與客家人）、跨族群（華人與馬來人）互動的經驗與生命史背景。這樣的跨文化溝通與尊重，也是浮羅山區小農園主，經營榴槿種植的基礎。

#### （四）榴槿種植園與多物種生態永續價值的反思

最後筆者想通過浮羅的小農榴槿種植園物語，轉而進入跨族群榴槿園藝的比較視野，並揭示其中所獲得的啟示——**多物種的永續價值**（這部分也呼應了 H 先生通過有機榴槿的種植試驗，對於多物種與自然的敬重與體悟）。雖然浮羅地區，擁有祖輩來自華南的客家方言群集聚現象，但此地區長久以來至當前的族群分布，仍以馬來族群為多數。<sup>18</sup> 本

18 Mohd. Nasser BIN MALIM (2016) 從土地與行政官僚及管理的角度，爬梳浮羅山背在英國殖民時期，自 1888 年浮羅山背開始設立縣署至 1956 年之間的變化。他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觀點，探索當時浮羅山背整體土地利用、產業及族群人口的樣貌。自縣署設立之初，馬來族群即是浮羅山背人口最多數的族群，接著為華人與印度社群。作者根

文所討論的重點，雖是浮羅地區，榴槤園園主／種植者以客家人為多的情況。但通過華人園主的訪談，我們所理解到經營榴槤園子的經驗，華人與馬來人間的差異，比華人方言群之間的差異來得凸顯。幾位華人園主／種植者的敘事中，都指出華人對商業利益較為敏感，也因此促使他們追逐某些有名、有市場價值的榴槤品種。如是目的性與價值觀，也展現在園子的種植過程。華人小農園主／種植者，會更加呵護園子裡的榴槤，盡量將雜草及其他會分散肥料吸收的植物物種移除。相對於此，馬來族群的園子，則多是採取較寬鬆的方式，包括投入的人力較少，容納野草與大棵雜樹的存在，並且也留著較多的榴槤老樹種。馬來人小農園主照顧園子的方式，相對來講商業利益價值沒那麼高，但卻存在生物物種多樣性與原生性之多物種共存的價值（參圖 21、圖 22）。

我們所獲得的這點理解，不僅延伸了幾位華人小農園主、記者 A 先生對於馬來小農園子的觀察與敘事，小農園主 H 先生對於有機榴槤種植的實作經驗與體悟，並也呼應了近年來同樣關注榴槤種植與生態環境的馬來西亞學者 Khoo Gaik Cheng（2022）的研究成果。他指出，在今日

---

據口述歷史及田野調查，馬來社群是最早來到浮羅山背的社群，他們的背景多元，有些從檳城威省遷移而來，有些則來自霹靂、吉打、亞齊與泰南區域，而這也顯示在之後馬來社群所居住村莊，許多以原居地來命名（idid：24）。定居於浮羅山背的馬來社群，從早期直至 1957 年，仍主要從事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活動。是因為農耕技術在馬來人中代代相傳。這也是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吉打州、暹羅南部（如北大年）和亞齊等農業州。而他們所從事的農業活動規模仍以小型為主。（idid：27）相對於馬來社群，在 19 世紀末期，一些華商受到殖民地政府邀請，逐漸來到浮羅山背，一開始是以市鎮為主要聚集地，之後才延伸至漁村地帶。華人早期的工作型態，包括木匠、石匠、鐵匠、商人、店主、種植園主、農業工人，種植肉荳蔻、丁香等香料。（idid：26）在當代的浮羅山背，馬來女性從事小商業活動，呈現活躍的樣貌，在市鎮與周圍，皆可見許多販賣日常食物的小販。而在浮羅市鎮的邊緣地帶，有許多中年婦女的創業者，販賣浮羅山背產的香料，如荳蔻與荳蔻汁等，及一些女性也販賣自製的餅乾（Habib Sultan and Yahaya 2020）。根據筆者的觀察，近年來，隨著浮羅山背整體聚焦於農業旅遊的發展，與其相關的產業與經濟活動，如觀光農場與之中所販賣的商品等，也成為一些居民的收入來源。

永續，卻未檢討在前端清理森林轉變為榴槤園過程中，對於生態、物種間造成的破壞。Khoo (2022) 找到一個替代的可能性。此項啟發來自於有機種植與 Orang Asli (馬來西亞的原住民) 在園藝種植上，所實踐的人與非人之間的關係。有機種植者與 Orang Asli，較為友善的對待土地，並將收穫與其他動物、昆蟲等分享。他們也種植其他花樹，或甚至在榴槤尾季時，會留下一些榴槤供小動物與野生動物食用。因此，Khoo (2022) 呼籲榴槤種植的永續，必須來自於重新思考關乎自然森林的保存，以及對於農業土地的商業使用，與原住民權利之間，如何開展出更為和諧的關係。



圖 21 榴槤園子裡的家禽

說明：a. H 先生家族園子裡養著成群的鵝與雞鴨。  
b. 作者拍攝於 2023 年 4 月 9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圖 22 榴槤園子裡的花草

說明：a. 相對其他所見的榴槤園子，H 先生家族園子裡較多小花小草。  
b. 作者拍攝於 2023 年 4 月 9 日。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謝誌：本文係臺灣科技部（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檳城浮羅山背客家及其周邊族群的地方社會：地景、環境與多物種人類學視野下的省思〉（MOST 111-2420-H-A49-001）之部分研究成果。由衷感謝田野推動時，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與浮羅山背地區，每位協助本研究的長輩與朋友

們。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全球客家研究聯盟 2023 年雙年學術研討會（臺灣桃園，2023 年 9 月 22-23 日）。感謝與談人及與會學者的寶貴意見。最後筆者要特別感謝《全球客家研究期刊》兩位匿名審查先生的評論與意見，給予本文修改過程中十分重要的提醒、協助與支持。

## 參考文獻

- 光明日報，2024 年，〈沈志勤當地辦比賽 讚新港也有好榴槤〉。《光明日報》（7 月 6 日）。<https://guangming.com.my/%E6%B2%88%E5%BF%97%E5%8B%A4%E7%95%B6%E5%9C%B0%E8%BE%A6%E6%AF%94%E8%B3%BD-%E8%AE%9A%E6%96%B0%E6%B8%AF%E4%B9%9F%E6%9C%89%E5%A5%BD%E6%A6%B4%E6%A7%A4>，取用日期：2024 年 7 月 9 日。
- 怪獸水果宅急便，2020，〈貓山王榴槤〉。《Facebook 怪獸水果宅急便》，2020 年 9 月 13 日。<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126240872542226&set=pb.100064929253254.-2207520000>，取用日期：2024 年 2 月 26 日。
- 張麗珠，2022 年，〈榴槤造句〉。《星洲網》，（5 月 30 日）。<https://www.sinchew.com.my/20220530/%E3%80%90%E5%A4%A7%E7%89%8C%E6%A1%A3%E3%80%91%E5%BC%A0%E4%B8%BD%E7%8F%A0%EF%BC%8F%E6%A6%B4%E6%A2%BF%E9%80%A0%E5%8F%A5/>，取用日期：2023 年 8 月 9 日。
- 湯九懿，2011，《浮羅山背的荳蔻產業與客家社群》。國立中央大學客

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溫梓川，1979，〈客家人在檳城〉。頁 717-725，收錄於檳榔嶼客屬公會四十周年紀念刊編輯委員會編，《檳榔嶼客屬公會 四十週年紀念刊 1939-1979》。檳城：檳榔嶼客屬公會。

劉振儀，2024，〈榴槤季節赴檳度假 到浮羅山背吃果王〉。《星洲網》，（6月28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40628/%E5%A5%BD%E6%96%99%E6%8E%A8%E8%8D%90-%E5%9C%B0%E6%96%B9/5715298?variant=zh-hant>，取用日期：2024年7月2日。

蔡晏霖，2019，〈找福壽螺拍片：邁向去人類中心的人類學田野技藝〉，頁 317-343，收錄於趙恩潔、蔡晏霖主編，《這反田野：人類學田野異托邦故事集》。新北：左岸。

\_\_\_\_\_，2020，〈金寶螺胡撇仔：一個多物種實驗影像民族誌〉。《中外文學》49(1)：61-94。

Airriess, Christopher, 2020, “Constructing Durian Terroir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 Penang, Malaysia.”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41: 6–22. <https://doi.org/10.1111/sjtg.12298> (Date Visited: May 16, 2025).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AHAGIAN PERANCANG EKONOMI NEGERI (BPEN), 2019, *Buku Data Asas Sosio-Ekonomi Negeri Pulau Pinang 2017-2018 (Penang In Numbers 2017-2018)*. Penang State Government.

- Bernama, 2024, “Over 63,000 Malaysian growers to benefit from export of fresh durians to China — minister.” In *The Edge Malaysia*, (19<sup>th</sup> June 2024) . <https://www.bernama.com/en/news.php?id=2309245#:~:text=%E2%80%9CThe%20Agriculture%20and%20Food%20Security,he%20said%20in%20a%20statement> (Date Visited: July 1, 2024).
- Cheng, Erik Siu Kei, 2017, *Selling Fish across the Strait: Taiwanese Aquaculture, Trade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Calgary, Canada.
- Cheng, Erik Siu Kei, 2019, “Managing a Hub: Regional Networks, Trade Governance, and Business Culture of Taiwanese Milkfish Sector.”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15 (2): 55-113.
- Current Population Estimates by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2025, “2024 Principal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Pulau Pinang, 2020-2024,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Economy, Malaysia.” <https://www.dosm.gov.my/portal-main/release-content/current-population-estimates-by-administrative-district-> (Date Visited: May 16, 2025).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24, *Current Population Estimates by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2024: Principal Statistics of Population, Pulau Pinang, 2020–2024*. Putrajaya: Ministry of Economy, Malaysia. Accessed May 16, 2025.
- Greenough, Paul, and Anna Lowenhaupt Tsing, 2003, *Nature in the Global South: Environmental Project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bib Sultan Nor., 2000, “An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Malay Women Traders in Balik Pulau, Penang.” Pp. 546-554 in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s Agent of Change for Industrial Revolution 4.0*, edited by N. Baba Rahim, vol. 81, *European Proceedings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European Publisher, 2020. <https://doi.org/10.15405/epsbs.2020.03.03.63> (Date Visited: May 16, 2025).

Haraway, Donna J., 200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Ingold, Tim,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JABATAN PERTANIAN MALAYSIA, 2023, “STATISTIK TANAMAN BUAH – BUAHAN” Portal Rasmi Jabatan Pertanian. [https://www.doa.gov.my/doa/resources/aktiviti\\_sumber/arkib/statistik\\_tanaman/2023/statistik\\_tanaman\\_buah\\_2022.pdf](https://www.doa.gov.my/doa/resources/aktiviti_sumber/arkib/statistik_tanaman/2023/statistik_tanaman_buah_2022.pdf) (Date Visited: February 26, 2024).

Khoo, Gaik Cheng, 2022, “Why Durian Matters: Tangling with Sustainability.” *Berita Newsletter (Malaysia/Singapore/Brunei Studies: Group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48(2): 33-38.

Latour, Bruno,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2017,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each, E. R., 1954,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 Malim, Mohd. Nasser Bin, 2016, *Perubahan Pentadbiran Daerah dan Tanah di Balik Pulau, Pulau Pinang 1888-1956 (Changes in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and Land in Balik Pulau, Penang)*.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 Malinowski, Bronislaw,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 MyTravel, 2024, 〈檳城榴槤山〉。 [https://www.mytravel.my/%E6%99%AF%E9%BB%9E%E4%BB%8B%E7%B4%B9?journal\\_blog\\_post\\_id=112](https://www.mytravel.my/%E6%99%AF%E9%BB%9E%E4%BB%8B%E7%B4%B9?journal_blog_post_id=112); Hernan Corporation <https://hernan.com.my/>，取用日期：2024年7月1日。
- OpenStreetMap, 2024a, “balik pulau.” <https://www.openstreetmap.org/search?query=balik%20pulau#map=11/5.3691/100.3718> (Date Visited: February 26, 2024).
- OpenStreetMap, 2024b, “balik pulau.” <https://www.openstreetmap.org/search?query=balik%20pulau#map=12/5.3497/100.2441> (Date Visited: February 26, 2024).
- Shoreman-Ouimet, Eleanor, and Helen Kopnina, 2011, “Introduction.” Pp. 1-33 in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Today*, edited by Helen Kopnina and Eleanor Shoreman-Ouime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Tsai, Yen-ling, 2019, “Farming Odd Kin in Patchy Anthropocene.” *Current Anthropology* 60(20): S342-353.

- Tsai, Yen-ling et al., 2016, “Golden Snail Opera: The More-than-Human Performance of Friendly Farming on Taiwan’s Lanyang Pla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4): 520–544.
- Tsing, Anna Lowenhaupt,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ikimedia, 2024, “Aeon (compan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USCO> (Date Visited: February 26, 2024).
- Wolters, O. W., 1982, *History, Culture, and Re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Wong Yee Tuan, 2015,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 Zakaria, Abdul Aziz, 2020, *Managing Durian Orchards in Malaysia*. Serdang, Selangor: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Press.

# **Terroir, Knowledge, and Ethnic Resilience: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Durian Cultivation among Smallholders in Balik Pulau, Penang**

Mei-Ling Chien\*\*

*Professor & Dean,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Yi Chieh Pan

*Analyst, Heritage and Regional Studies Programme,  
Penang Institute, Malaysi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tricate dynamics of the small-scale durian orchard industry in Balik Pulau, Penang, Malaysia, employ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centered on in-depth interview narratives from durian orchard owners and growers,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whom identify as Hakka. This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allows for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the lived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of thos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exploration of two interconnected yet distinct lines of inquiry.

The first line of inquiry delves into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the prevalent small-scale durian orchards within Balik Pulau and its adjacent regions. It seeks to unravel how a confluence of factors shapes the operational landscape and evolution of these agricultural

\*\* Date of Submission: March 5, 2024

Accepted Date: May 25, 2025

units. These factors include the inherent attributes of the loc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encompassing soil composition, topography, and microclimatic variations, which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durian cultivation. Furthermore, the study examines the role of the growers'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particularly the traditions and practices associated with the Hakka community, in shaping their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nd l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Family backgrounds and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are also considered crucial elements influencing orchard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ility. Moreover, the research acknowledges the impact of resource disparities among growers, including access to capital, technology, and market networks, on the scale and intensity of their operations. Finally, it explores the diverse perceptions and aspirations that growers hold regarding their durian orchards, and how these imaginaries translate into tangible actions and management decisions. Underlying this exploration i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herent resilience of the Hakka community and neighboring ethnic groups in the face of 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within this specific agricultural context.

The second primary line of inquiry shifts the focus to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owers and the durian fruit itself, utilizing Penang Island, particularly the agrarian landscape of Balik Pulau, as the primary field site. This part of the study examines how the specific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terroir of Balik Pulau, characterized by its tropical monsoon climate and unique soil profiles, interact with the adopted conventional farming practices

and the diverse cultivated varieties of durian. It investigates how these factors collectively shape the cultivation cycle, yield patterns,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fruit, thereby influencing the growers' labor practices, economic returns, and perceptions of their livelihoods. Central to this inquiry i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durian orchard as more than just a sit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stead, it is viewed as a tangible microcosm—a bounded geographical space that encompasses a complex web of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relationships. These relationships extend beyond human interactions to include the ecolog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durian trees, the soil, local fauna, and other element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Moreover, the orchard embodies accumulated systems of knowledge, both scientific and traditional, pertaining to durian cultivation, pest management, and soil conservation.

Through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life stories, daily labor practices, and accumulated knowledge of the interviewed durian growers, this research endeavors to provide nuanced insights into several key themes. These include the resilience exhibited by local ethnic communities in maintaining their agricultural traditions and livelihoods, the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small-scale durian orchards, the transmission and adaptation of cultivation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across generations, and the often-overlooked sustainable valu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in these agricultural systems. Ultimately, this study aims to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o-cultur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of small-scale agriculture in Penang, using the case of the durian

industry in Balik Pulau as a compelling example.

Keywords: Durian, Hakka, Local Knowledge and Inheritance, Ethnic Resilience, Penang of Malaysia

